

以“礼”行礼 滋润心灵

——春节的文化底蕴

杨朝明

■ 阅读提示

■ 从礼俗到礼仪，再到礼义，春节各种节庆习俗，集聚着礼乐文化的精神。

■ 我们需要温故知新，返本开新，正确认识和理解包括春节在内的传统节日的意义，挖掘其丰富文化内涵，把握其精神实质，以“礼”行礼，将礼的真精神切实贯穿于具体施行中，形成尊道德、崇道德的社会风尚。

从除夕之夜的团圆盛宴，到正月初一的万象更新，春节这个最盛大的传统节日，充满了浓浓的中国味儿，凝聚着中国人的美好情感和心愿，也承载着丰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化底蕴。

春节历史悠久，在千百年的漫长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多样的年节习俗和礼仪，如我们熟知的贴春联、放鞭炮、守岁、拜年、祭祖先、压岁钱等等。虽然各地具体习俗可能会有些许差别，但都吉祥喜庆，表达了美好的祝愿。从深层来看，更蕴含着中华礼乐文明和传统美德。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义之邦，“礼”是中华文明的内核，“礼”的形式在五干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并不断变化，而“礼”的精髓却一脉相承。周公继承夏商两代文化，经天纬地，制礼作乐，使礼乐成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行为的规定，并逐渐演进为一种底蕴深厚的人文文化。这是一个继承和创新的过程。《论语》说“因不失其亲（新），亦可亲也”，就是说在继承的同时不断创新，这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几千年来的发展轨迹。

在古代，祭祀是过年最重要的仪式。现在，过年时，很多人仍然会用不同方式拜祭祖先。年节礼仪之中如祭祖、敬老、尊长等，彰显了爱与敬的“至德”“要道”。“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我们追忆先人，并不是单纯地回忆过去，更多的是着眼于现实世界的人间关怀，它能够净化社会风气，使人民道德仁厚。欢欢喜喜过大年，把祖先与子孙、过去与未来，把上、下、左、右交融共生，突出一个“和”字。《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家庭和谐才能发展，正如春天的万物生长。春节实际上就是团圆和谐的节庆，让人们和谐自己的内心，并由此形成家庭的和谐、人际关系的和谐等等。

春节是弘扬家风的绝佳机会。中国古代思想家思考的问题，其核心内容不离“家庭”“孝道”“和睦”。中国哲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关于“家”的哲

总结，初春则评定官吏，为新的一年国家治理打下基础，与辞旧迎新相对应。在阖家团圆的氛围中，家人欢聚一堂，亲朋好友、左邻右舍互相走动，在自然和睦的闲话家常中，畅谈各自收获感受，交流情感，谋划新的一年，表达对未来的美好希望。这不仅仅是仪式，而是通过满满的仪式感，让爱与敬的情感升华，激发个人的精神气质，增进家庭的幸福和谐，进而就是国家的蓬勃发展。这正是中国人的家国情怀。

到了孔子的时代，礼坏乐崩。孔子儒家继承周代的礼乐传统，并进一步思考如何在礼的形式中体现礼的内涵，对“礼”进行系统阐发，以德治、仁爱等思想筑牢中华礼乐的“文化大厦”，为其注入了强大生命活力，使之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礼之仪要体现礼之义，人们的言行举止要体现礼的内在意义。从礼俗到礼仪，再到礼义，春节各种节庆习俗，集聚着礼乐文化的精神。

中国的礼乐文化是合乎天道、顺乎人情的。每到春节，忙碌了一年的人们都踏上归途，与家人团聚在一起，告别旧岁，迎来新年。而在大自然里，冬的寒意正在慢慢褪去，春的生机开始缓缓萌发，这是重要的时间点。《孔子家语》里孔子谈到周礼时说：季冬正法，孟春论史，治国之要。意思是冬末考察德治法令，调整

学，我们在家庭里扎下做人的根本，知孝悌，懂爱敬，然后从家庭走向社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进而就能“泛爱众”“四海之内皆兄弟”了。

礼仪文化沉淀在社会脉络之中。如果我们不理解礼乐文化的深层意义和风俗礼仪的内在关系，就很难理解它的内在美。这样看来，读懂春节，就读懂了传统，就读懂了文化。春节积淀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智慧，折射出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新时代要有新内涵，

新时代要有新内涵，



本报记者 齐波 摄

人们的生活方式变了，春节习俗和礼仪有的也会随之演变，但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则代代相传。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提高人民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春节是弘扬传统美德的重要节点，礼之用，和为贵。包括春节在内的中国节日属于广义的“中国礼”，中国礼乐的终极目的，是造就和谐的人际关系与社会秩序。为此，我们需要温故知新，返本开新，正确认识和理解包括春节在内的传统节日的意义，挖掘其丰富文化内涵，把握其精神实质，以“礼”行礼，将礼的真精神切实贯穿于具体施行中，形成尊道德、崇道德的社会风尚。只有这样，才能守正创新，立足新时代，过好这些具有“中国”意涵的节日，发挥其滋润人们心灵的德化作用。

（作者系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推动古籍数字资源共建共享

本报记者 张丽

日前，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天津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苏州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等6家单位，在线召开古籍数字资源联合发布会。6家单位新增发布古籍资源6786部（件），其中国家图书馆建设的“中华古籍资源库”发布古籍影像资源超过10.2万部（件），先后联合39家单位发布古籍资源2.8万部（件）。

国家图书馆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任熊远明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国家图书馆为代表的各古籍收藏机构将继续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给国图老专家回信精神，坚守“传承文明、服务社会”初心，按照中宣部对古籍工作的总体部署和顶层设计，认

真贯彻落实全国古籍工作会议精神和中办、国办《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要求，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主动担当作为，积极探索共建共享途径，持续不断开放共享古籍资源，借助全国智慧图书馆建设体系不断提升服务水平，继续深入挖掘古籍的深厚内涵和时代价值，提高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传播能力，共同为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贡献力量。

与会者认为，古籍保护的目的在于传承和利用，古籍数字资源的在线发布与共建共享，使社会大众和研究者可以足不出户浏览古籍资源，在有效解决古籍保护和利用矛盾的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古籍传播，为中外学者方便地研究古籍提供便利，对于揭示和坚守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坚定和增强文化自信，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通过“中轴线申遗”讲好中国故事

本报记者 杨雪

目前，北京中轴线申遗进入最后冲刺阶段，2023年2月我国将正式提交申遗文本。

南起永定门，北至鼓楼、钟鼓楼，纵贯北京老城，这条跨越了7个多世纪、全长7.8公里的中轴线，被梁思成先生盛赞为“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在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戏曲学院院长尹晓东看来，中轴线申遗的过程，应该成为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过程。

尹晓东在考察中发现，目前申遗还存在许多问题，我们注重了加强古城保护、文物建筑修缮等方面，但与中轴线密切关联的以昆曲、京剧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得到充分挖掘和彰显。中轴线及其周边区域，有中国戏曲学院附中、北方昆曲剧院、北京京剧院、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还有中央芭蕾舞团、中国歌剧舞剧院等诸多院团。我们对中轴线上

文化景观阐发不够，对这些资源还缺乏有效整合，没有形成有世界影响力的艺术活动品牌。

为此尹晓东建议，需要在北京中轴线申遗过程中阐发更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讲述文化遗产与中国精神文化生活之间的关系，讲述非遗对城市生活的滋养，以此突出昆曲、京剧两个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诞生和传承发展与中轴线之间的独特关系；通过中轴线申遗，讲好中国人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守正创新的文化追求，讲好对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故事；大力做好外宣工作，把中轴线申遗的过程变为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过程；创立以中轴线为主题的文化艺术活动品牌，把它融入北京国际交往中心建设等统筹规划中，通过举办文化交流活动，把中轴线变成向世界展现中国人开放的文化胸襟的舞台。

感受中医药文化的“智慧之光”

本报记者 谢颖

中医药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具有鲜明而又独特的生命观、健康观、疾病观和防治观，实现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融合和统一，蕴含了中华民族深邃的哲学思想。近日“智慧之光——中医药文化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500余件（套）文物藏品，辅以200余件（套）药材实物，从发展历程、防治观念、医学典籍、中医药材、诊疗器具、未来展望、国际合作等不同角度出发，充分展现了具有悠久历史和独特理念的中医药文化体系。

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

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中医药学不仅是崇尚“天人合一”“阴阳平衡”“辨证论治”“上工治未病”的求真务实之问，还是致力于“悬壶济世”“大医精诚”的扶弱行善之学。《黄帝内经》《伤寒论》《本草纲目》等杏林典籍浩如烟海，扁鹊、张仲景、华佗、孙思邈、李时珍等岐黄名家灿若星汉，集中闪耀着中华民族的博大智慧之光。在展览中，可以看到“文明之钥”“摄生之道”“灵兰秘典”“器药精英”“传承创新”五个不同的单元，玉石、陶瓷、骨器、金银器、古籍、书画、革命文物，以及药材实物等展品，令观众充分感受到中医药文化的内涵和当代价值。

用文化赋能艺术产业融合创新

本报记者 郭海瑾

日前，2022“融合·创新”艺术与产业合作会议在江西举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艺术与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博物馆馆长陈履生在会上作了《艺术产业融合与创新的文化基础》的发言。他表示，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艺术的产生与发展实际上都是伴随着文化的发展而前行。从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到夏商周三代的青铜器，以及周周开始的桑蚕与织造、战国的漆器、六朝的青瓷到明明的青花瓷等，都是文明和文化的发展以及文化的累积所造就的，不是一个产业的产物。

陈履生认为，艺术创造与产业制造在互为推动之下的发展，形成了一种特别的关系。艺术创造带动产业发展，而产业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艺术创造，更重要的是推动了艺术的普及。艺术与产业的成就受制于文化内涵，文化的高度决定了艺术与产业的高度。艺术与产业的当代问题，则是需要我们去深入研究的。

为此，陈履生从三个方面提出建

议。首先要关注产业规模问题。产业规模要适度，适度的产业规模对艺术、对文化都有好处。其次是把握艺术与产业的融合问题。二者相互促进、互为依靠，但融合是有难度的，因为艺术和产业在本质上有所差异，如果不能很好把握产业的发展，那就有可能伤及到艺术。最后要重视艺术与产业的创新，创新是发展的动力。他总结，要用文化赋能艺术与产业的融合与创新，提升融合与创新的高度、造就融合与创新的时代成就、延续融合与创新的文脉。



晋代的“中正六条”说

王杰

晋代分为西晋（公元265年—公元317年）和东晋（公元317年—公元420年），西晋只有四位皇帝，仅52年。东晋共有11位皇帝，103年，这样，两晋共传15帝，155年。公元265年，魏国晋王司马懿篡夺魏国政权，建立西晋，是为晋武帝。晋武帝在统治时期，励精图治，勤于国计民生，医治战争创伤，国家出现了繁荣景象，由于晋武帝年号“太康”，历史学家称他统治时期为“太康之治”。为什么在晋武帝统治时期会出现这样短暂的政治清明的气象呢？这与当时的官僚制度有着直接的关系。

晋武帝时期颁布的《诸郡中正六条举滞滞令》，对官吏的德行准则有了明确的规定，形成了“中正六条”说。这“中正六条”的内容是：

一曰忠恪匪躬，二曰孝敬尽礼，三曰友于兄弟，四曰洁身劳谦，五曰信义可复，六曰学以为己。

“中正六条”说，在精神实质上是对“孝道”的一种应用，把“孝”文化拓展到治理国家上。

“孝”不仅是维系家庭稳定的道德伦理，还是进行社会治理的重要规范。在我国古代社会的诸多关系中，最根本的关系就是君臣关系和父子关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人道之大经，政事之根本也。”以“孝”治理天下，源于汉代。《史记》本纪中，汉代皇帝本纪前都加一“孝”字，如“孝文本纪”“孝景本纪”

“孝武本纪”。汉代在选拔官吏上，有专门的“孝廉”科，乡里推举出的“贤孝”之人，便可委以官职。晋代承袭汉代，继续以“孝”治理国家，即李密在《陈情表》中说的“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于是在晋武帝时期，有了《诸郡中正六条举滞滞令》。

一曰，忠恪匪躬。从字面上看，就是忠心耿耿、鞠躬尽瘁的意思。晋武帝希望各级官吏都能恪尽职守，为国家社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太康之治”时期，涌现了一些干臣。司马懿会发现和运用这些干臣，如太常丞许奇的父亲许允，因参与魏文帝废除司马师的密谋，此事泄露后被杀，司马懿认为许允的儿子许奇是个人才，并没有因为他父亲被杀而埋没他，相反，先提拔他出任太常丞，这是掌管朝廷祭祀礼乐的近侍，经常跟随皇帝参加各种活动，随后提拔他当了祠部郎，主掌朝廷祭祀之事；还有就是蜀汉旧臣，一些忠于蜀汉的学者如谯周、文立和诸葛亮孙子诸葛京等，在司马懿统治时期，都受到了重用。因为皇帝带头使用贤臣，所以晋朝在经过三国混战民生凋敝的基础上，勃然而兴，一代治世的局面就出现了。

二曰，孝敬尽礼。就是尽孝道应该符合礼的要求。国家提倡“孝道”，并不是要求“逆来顺受”。对父母双亲的过失，要委婉地指出，不指出就是陷父母于不仁不义之中，就是大不孝。这里面加入了理性的思考。《孝经》中有“谏诤章”，阐述了尽孝不能盲从。如果把这一要求进一步运用到治国理政上，那么，对上级和国君，做臣子的应该及时匡正他们的过失，更好地造福百姓，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更深意义上的尽孝，是大孝。

三曰，学以为己。就是尽孝道应该符合礼的要求。国家提倡“孝道”，并不是要求“逆来顺受”。对父母双亲的过失，要委婉地指出，不指出就是陷父母于不仁不义之中，就是大不孝。这里面加入了理性的思考。《孝经》中有“谏诤章”，阐述了尽孝不能盲从。如果把这一要求进一步运用到治国理政上，那么，对上级和国君，做臣子的应该及时匡正他们的过失，更好地造福百姓，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更深意义上的尽孝，是大孝。

四曰，洁身劳谦。是指居官者应该品德高尚，谦卑勤政。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很多的勤政为民的好官。据《史记·循吏列传》记载，战国时期楚国丞相孙叔敖“施教导民”“政缓禁止”；子产为郑国丞相，使得郑国大治；石奢为楚昭王相，“竖直廉正，无所回避”；李离在晋文公时担任理官一职，“过听杀人”而“伏剑自刎”……这些都是受后代敬仰的清官廉吏。晋武帝司马懿希望晋朝官员勤于政事，积极作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五曰，信义可复。人的信义要经得起检验才行，也就是要求为人要做到诚

信不欺、言行如一。官场中，花言巧语、阳奉阴违的人多，越是这样的人，智慧明智的领导是不会重用。办实事的人，为人低调，话不多，做事踏踏实实、勤勤恳恳。

晋武帝司马懿对人性，对官场有着一双慧眼，他怕朝中出现不实在的人，对自己的政权带来危害，所以在选官用人方面，开诚布公地提出了“信义可复”：要求官员对朝廷忠心不二、表里如一、光明磊落；强化责任担当，明明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

六曰，学以为己。这一条语出《论语·宪问》。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是什么意思呢？是说古代的人学习是为了提高自身修养，而现在的人学习是为了装点门面、在别人面前炫耀。学习是为了给别人看，就有了功利性。如果是为了得到君主的任用而学习，那么就会很功利，为了达到目的，很可能不择手段。因此，司马懿更喜欢用“学以为己”的人。这样的人，内心纯净，心底坦然，是在品德和政治上靠得住的人。

《晋书》中所说在司马懿时期“晋德既洽，四海宅心”，这与司马懿重视人才是分不开的。同时，司马懿用人的“六条标准”、遵循的“一条红线”就是重视人才的德行的具体表现，可见修德为成才之首，更是居官之首。

“中正六条”中蕴含着传统美德和处事智慧，我们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汲取“中正六条”中蕴含的文化营养，大力弘扬中华传统孝道，培育家国情怀，提倡诚实守信，促进廉洁自律，提升人民群众道德素养，营造良好社会风气，实现老有所安、幼有所养、家庭和睦、社会和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保障。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实学研究会会长】

